



民盟智库

中英双语典藏版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美】乔治·埃尔顿·梅岳 著 费孝通 译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美】乔治·埃尔顿·梅岳 著 费孝通 译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 (美) 梅岳著 ; 费孝通译 .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3.10

(民盟智库)

ISBN 978-7-80256-462-6

I. ①工… II. ①梅… ②费… III. ①工业社会学—研究 IV. ①F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501 号

出版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陈 佳
封面设计 群言艺术中心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62436 6527660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462-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费孝通

(1910—2005)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出版说明

1941年3月，中国正处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艰难时刻。在这风雨飘摇之中，一批情系民族存亡、心怀救国之志的知识分子与爱国精英，发起成立了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一代又一代的民盟志士尽心竭力，奔走国是，用自己的赤子之情和卓越智识，追索民族复兴之路。

民盟先贤们在追索途中为我们留下了经济、

军事、外交、教育、社会、文化等领域里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智库”。整理、出版“民盟智库”系列丛书，旨在传承先人们为国家富强努力之精神，光芒之思想；激励当代知识分子忧国之忧、思国之思、行国之行。

《民盟智库》编委会

原序

这是梅岳教授所写的一套著作中的第二本，这一套著作按现在的计划一共是三本。合起来，它们将提出 25 年来在工业现场研究里所挑选出来的某些方面的研究结果。进行这项研究是为了取得对人与人的关系——这个最被忽视的题目——更好的和更根本的了解，并设法去改进它。这几本书也提供了梅岳从他在开始研究工业里的男女工人以前就具有的长期的自我训练和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对人事的现场经验所建立起的成熟的思考。由于他早年的工作，当他转而注意工业时，他为他的研究带来了“……第一，对事物的亲密的、惯常的、直觉的熟悉；第二，对事物的系统的知识；第三，对事物的有效的思考方法”。这些是已故的汉德逊认为在新的领域里进行客观的现场研究工作的基本必要条件。

梅岳是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业研究部任职 20 年左右的老教授。由他和他在工业里和学校里的同事们所进行的这个研究部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对具体的工业情况的第一手的现场研究。这 20 年

研究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逐渐增加真知灼见的历史。

他第一本关于工业研究的渊博的报告,《工业文明里的人的问题》,于1933年出版,不幸现在已经绝版。在那本书里,梅岳在研究和获得对个别工人同他们工业里的工作关系的更好的了解上,以及在促进他们在安于自己工作的感觉上,开辟了新的途径。此后,在他的同事们的指导和合作之下又继续发表了西方电气公司所进行的五年研究计划的详细报告¹。所有这些报告都承认社会集团团体的协作,正同一个个工人一样的重要。怀特赫德的研究,根据对西方电气公司所保有的出色的实验记录所做的审慎的统计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对影响在实验中的这个集团的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委特利斯伯克和迪克森的著作说明了同类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如此,这三个报告的最终结果,对于读者来说,是着重于个人,当然包括着重在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个人。

在离开前一本著作已有12年的这一个报告里,梅岳所持的重点已有所改变:它并不排除个人,但却着重提到团体的重要和了解团体行为的方法,不论这些团体是有正式组织的和为行政管理所承认的或是自发的、非正式的组织。后一种团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存在,常常为行政管理所忽视,甚至也为工人们自己所忽视。这个报告提出了在主要工业活动上如何获致团体合作的问题。它也指出了由于急速的技术进步和继之发生的工人们在工作中经常变动的人事

1 商学院的I. N. 怀特赫德所著的《产业工人》,哈佛大学出版部,1938年剑桥版;商学院的委特利斯伯克和西方电气公司的迪克森合著的《经营管理和工人》,哈佛大学出版部,1939年剑桥版。

关系所引起的这一问题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种对于旧有的处理技术的能力¹的持续不断的破坏没有受到行政管理上应有的注意。由于邻侣生活的持续不断的破坏和在我们周围的为梅岳所谓的定型社会的稳定性的影响不断松弛，这种困难也就当然更为加重。这种困难大部分是由于实用科学对人们在工业里的生活的冲击，以及重要的发展如汽车等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冲击。

在这里，梅岳也给我们一些例子说明有些工业的行政管理成功地使工厂里的团体在它们对于相互合作的态度上获得如此的稳定，以致团体中的成员明确地承认工厂已成为他们发展满意生活的稳定力量。这种成就是在厂内技术不断变化和厂外社团生活充满混乱的情况下得到的。这样，梅岳第一次通过特定事例的形式为我们指出，在工业内部本身，创造出一个可以部分有效地代替旧有邻侣生活所提供的稳定作用的办法，是在工业的行政人员的能力之内的。有了稳定的就业，就有可能使工业（有如我们国家生活大部分时期中的小市镇）好像一种维持生计的方法一样，也可以成为一种在社会方面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方法。

这种看法似乎同现存的介乎劳工和行政管理之间的战斗以及困扰着我们的日益增长的仇恨和成见有着很大的距离。然而，除非我们能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工业文明里重新恢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存在着个人差别而须具备的近于互相了解的能力，除非我们能学会

1 这本书里有两个带有关键性的名词，一个是 technical skill，一个是 social skill，参照本书论旨，前者一般译为“处理技术的能力”，后者一般译为“处理人事的能力”，即和人相处的能力。——译者

怎样使我们的文明适应于不断的变化，否则我们在自己国内的事务中都无法维持必要的稳定，也无法成为国际和平的有效力量。当然，我们国内当前的情况并不能使斯大林先生得到一种印象，暗示我们将成为对海外和平的一个持久的力量。很少迹象可以表示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个具有适应力的文明问题，足以应付不断的技术和社会的变动。

梅岳还有一桩要研究和解释的工作要做。我们需要他那本更完整地发挥其引人入胜的理論的书——《一个“具有适应力的”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当那本书问世时，我希望它将解决的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及其内部有效合作的问题，而且更多地注意到在那集聚着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中所存在着的同样关于获致合作的问题；在这种大规模生产里，高度的技术效率经常同日益增长的工业内外的社会分解发生矛盾。

在工业内部和在各级学校里都有一项教育工作要做，而在这项工作上，在他的领导下，梅岳与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里的同事们，已经做了不少，证明重要的成就是可能的。

W. 唐内姆

导 言

亲爱的唐内姆：

这里是你要求我在摆脱职务之前写的书。在任何意义上，这不是自从你和我——你当时是行政学院研究院的院长——同意极其需要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所做的工作的全部报告。这样一种研究，如果从已经由生物学或有关人的因素这方面的临床医学所证实的假定出发，而不是从其他假定出发，我们相信，它将比直接去研究劳工关系更有效果。我们在纽约的谈话距今已经有 20 年了，而就在那次谈话的下一年——1926 年年中——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就在洛克菲勒纪念金即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开始了。当时几乎马上有疲劳问题实验室的汉德逊、博克和迪耳的参加。1927 年，娄特利斯伯克开始他对哈佛大学学生极其困难的有价值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尚未出版。在这本书中要包括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劳问题实验室的许多同各方面的成就——其中有些还属军事秘密——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不遵循一条单轨去追寻

我们各项研究的无比复杂的启示的发展，并将尽我的能力说明我相信这种启示所具有的对于我们这个被战争所蹂躏的世界的重要性。

自从我们在 1925 年第一次谈论了这些事情之后，局面已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在那时，美国或是它的一些自以为是领袖的人们相信繁荣的一般水平已经建立了起来，而循环地发生的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被克服了。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相信，或是至少希望，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开始认真而谦恭地工作，用和平和智慧来代替战争和民族自负。工业的问题看来还没有包含任何对合法改良的隐蔽威胁。没有人预想到对文明的基础会发生野蛮的进攻。简单说来，在这里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社会对那些 1929 年以后所发生的致命事件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现在，经过了一次严重的衰退和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我们面对着一个可怜的改变后的世界——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和十足的人类的混乱；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觉醒了的和游移不定的群众完全没有准备好负起他们面临的艰巨责任。在东欧，同在中国一样，农民完全从他那默然忍受和表面上的满足中彻底奋起，正在要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同在原始人类里所常见的一样，他相信他所要求的一定会得到实现，只要要求的声浪足够浩大。更高的生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创造和费力去赢得的，而这一点却非他所能了解；如果得不到实现，他会很容易认为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资本家——有意把持住不给他的。

还有些人——可能是广播评论员——由于他们对“民主”的热心辩护，似乎认为在代议制政体的许多形式中总有一种可以做到像

一个具有妖术的符咒一样——能帮助不论文化怎样低的人民有成效地和有系统地整理出在合作上所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理论，至少有三个条件限制着民主政体的适用。它们是：

第一，必须在处理技术的能力上和文化水平上有足够的一般标准。可能这个条件不完全适用于，例如，英国历史上某些时期，当时文学和学术的特殊阶级大部分限于宗教集团。在那样一些时代，僧侣阶级所有的政治权力是很有限的，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实际上有权力的和有技术成就的阶级，虽然可能比平民们更有行政经验，但一般并不是有文化的。但是在一个现代的和工业的社会里，最后的决定权，如果这些决定是合理的和进步的话，必须授予那些既具有对技术的理解又具有对社会的理解的团体。这个必需的条件无论如何并不排斥工人及其代表的参与，虽然法律界里有些还沉溺于腐旧的和口头上的主权论的那部分可能会受到排斥。实际上，对于要有一个实际技术和文化的标准的这一要求，只是说明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一个具有适应力的社会，只有具有适应力的人才能加以控制。而这又包含着一种需要，就是对于训练和教育的概念需要大大地改进，训练和教育的方法也同样需要改进。个人的适应力只有通过经验和教育才能获得。一成不变的日常训练只适合于一个“定了型的”社会；它不能满足由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世界的需要。

第二，代议制政体在一个由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组成且在物质生活标准上表现出极端差别的社会里，并不一定能令人满意地为社会公众的福利服务。这个先决条件特别真实地反映出较低的阶级为了生活而艰苦劳动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生理的和社会的需要。历史上

这种例子很多，如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和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将整个社会具有足够高的物质生活标准作为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是个明智的规定。英国在战时保证每个儿童，不论他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情况，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足够的供应，就是认识到了这个需要。

第三，代议政体如果在一个许多团体互相敌视仇恨、从而内部分裂着的社会里，那是不能行之有效的。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严重的危险，民主国家里的一些政治领袖和工业领袖对于行政方法的极端无知，也容易引起在合作上日益增长的无能作为。凯逊指出¹那种郁血症——那些具有社会职能的团体不能合作和继之引起的相互的敌视——曾经成为伟大文明的破坏者。

在短短的 15 年中，俄国曾努力把生活在东欧和北亚这一广大地区上的原始的居民提高到一个具有专门技能和能写能读的文化水平，而这是不可能运用所谓民主的方法在很多世代里完成的。正在和平的艺术刚要获得相当成就的时候，它受到了野蛮的德国掠夺者的进攻，以致它的主要成就被无情地破坏了。在美国和英国相当大的物质协助下，俄国挽回了危局，并把侵略者驱逐了出去；在同盟国的军事协助下，它充分履行了它的责任把德国人击败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这个希特勒自称在任何强国的联合下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国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成就上，它获得了各方面不同的人民团体的自发的和全力的合作；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完全归之于国家的危急，虽然当时的危急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很自然，对随

1 《进步和灾难》，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社，1937 年版，第 205 页。

便乱讲“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俄国，对上述三点限制条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清楚的也是俄国人。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分歧是出于对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的观察。在英国和美国，专门技能和一般文化的水平是高的，这是由于它们已有将近200年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普通居民都能粗粗阅读的缘故。在俄国就不是这样，它所掌握的专门技能和文化能力必然在它看来还是幼稚的。俄国在发展和平的艺术的同时是否能够也以同样的步伐向民主和群众管理方面发展，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一直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明里无休止地谈论着的民主这个字眼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在英语国家的民主和所有其他的政体之间的区别是重要而深刻的。所有其他的政体是单面性的，只有民主政体是多面性的。其他的政体，从罗马帝国起到墨索里尼的那个下贱的法西斯主义，可以用一张工程蓝图来表示——权威集中在顶上，以下各级的权威只能由顶上的权威所批准或授予。“霍布斯的巨大的利维坦¹，圣典学者的充分的权力 (plenitudo potestatis)、神秘的权威 (arcana imperii)，奥斯丁的国家主权，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名称——这就是从国家统一的概念所演绎出来的立法者具有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至于目前正在考虑中的它是国家或是教会，那是无关紧要的。”²

在民主国家里没有这样一种最终集中在顶层的权力；从理论上

1 利维坦 (Leviathan) 是《旧约》里巨大海兽的名称，霍布斯用它作为书名的意思是指巨大的权力。——译者

2 菲吉斯：《现代国家里的教会》，伦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913年版，第79页。

说，权威的中心应按照形势的要求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民主政体比君主政体以至共产主义等其他一切政体来得优越。所有其他的政体都是中古式的和僵硬的——权威集中，不论称之为国王或法律——反之，民主政体却大体上非常接近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规范。在国家遭遇到危急的时候——衰退、战争、瘟疫、水灾、饥荒——中央当局暂时必须掌揽权力，就像一个暴君一样地独断独行，但当危急已经过去，中央的控制就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到周围的许多组织；因为在工作台上和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的组织才一直是自发的合作的策源地。中央的和周围的权威就是这样互相补充的——来自上面的是合乎逻辑的和具有目的性的控制，来自下面的是自发的和合作的控制。从历史上说，伟大的民主国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而不是权威；它试图把任何困难发生时作出决定的中心安放在接近于形势所要求安放的地方。一个明智的行政人员就是这样地规划出他的政策，即使在现代工业里人们也能找到这样的行政人员。使所牵涉到的团体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同由少数具有高深专门技能的人所设计出来的合乎逻辑的和有目的的规划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在谋求技术上的进展之外还要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的参与和合作。

这样，有效的合作是我们在 20 世纪中叶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完全被忽视的什么是自发参与的决定要素的问题上，必须安心回到耐心的踏实的工作中来。民主制度的定期选举只不过是使一个社会把控制的中心按照智慧和理解所指示的方向而转移的一个原始的和粗糙的办

法。在这些事件上，我们的政治领袖和科学领袖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必须重新再试。

政治的领导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深入讨论，虽然第二章《乌合之众的假定及其必然的推论，国家绝对》里指出了在我们的政治思想里与经济思想里一样存在的缺点，然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什么时候出版一本关于研究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的书。

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情况的研究，在可能把运用在工业里进行现场研究这一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叙述出来之前，需要有一些先行的按语。因此，在第一章《进步的黯淡面》中提到了系统研究中的不平衡状态——对技术的和物质的研究的过分偏重而把人的和社会的领域（医学除外）放弃给那些无聊的“主义”和偶然的猜测。

如果必要，原子弹在这个时候出来提醒我们要既注意我们的成就也注意我们的失败。我们已懂得怎样在一刹那间毁灭千万的生灵，却不懂得怎样有系统地着手引导各种团体和国家在创造文明的事业上进行合作。

并不是原子弹要毁灭文明，而是文明社会能够毁灭它自己——无疑地，最后要用到炸弹——如果它缺乏明智的理解和不能控制对合作的支持和阻碍。

你对于为了认真负责的生活所作的教育的讨论指示出了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

你最忠诚的，

E. 梅岳

1945 年 10 月 1 日